

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

SANMENXIA DIQU KAOGU JICHENG

李久昌 主编

大象出版社

上



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

(上卷)

主 编 李久昌

副主编 许海星 倪玲玲 樊莉娜

 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 / 李久昌主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47-6288-8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文物—考古—三门峡市
IV. ①K87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7128号

责任编辑 董中山 韩凤葛

责任校对 何 力

封面设计 刘 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18号 邮政编码450044)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市森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00印张

字 数 2600千字

定 价 520元 (全二卷)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丹城路

邮政编码 471000

电 话 0379-63210905

序

◎刘庆柱

地处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的三门峡地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区，这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元明时代延续不断。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之很早就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地区。

翻开中国考古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考古学的序幕从这里拉开，其标志是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地就在三门峡渑池仰韶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也是从这里起步，三门峡地区堪称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圣地”。

谈到仰韶村与“仰韶文化”，首先要提到的就应该是历史大幕的开启人——瑞典著名科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他作为当时中国政府邀请的外国专家，在1914年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开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地质学与史前考古学的“天然”学科联系，使他很早就关注到中国史前考古学。早在1920年，安特生就发表了他的最早一篇考古学论文——《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与此同时，1920年底安特生安排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业务人员，在渑池仰韶村一带寻找了数以几百件的磨制石器。其后不久，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确定了对其进行考古发掘。1921年秋季，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由安特生负责、中国地质调查所对渑池县仰韶村及其附近地区的史前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主持的考古发掘与发现，确立了中国石器时代的存在，命名了“仰韶文化”，使这里成为了仰韶文化的第一个发现地。1923年，安特生根据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将仰韶村史前遗存视为早期中国人的文化，撰写、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由此，“三门峡”及其渑池仰韶村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使之闻名遐迩！三门峡的渑池仰韶村也造就了一代伟大的、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安特生。

新中国60年来的考古发现，又使三门峡地区的人类历史活动从新石器时代，上溯到更为久远的旧石器时代。在灵宝、三门峡、渑池、卢氏等地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存或古人类化石，其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了整个旧石器时代，这里成为河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

继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之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门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新中国建立伊始，夏鼐先生就主持了对渑池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对陕县庙底沟遗址、三里桥遗址和灵宝西坡遗址等进行了大面积、长时间的考古发掘。上述考古发现确立了以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重要考古发现还有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和洪洞耿壁遗址、灵宝西坡遗址等。这里我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灵宝西坡遗址，近年来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位于西坡遗址中心区的两座特大房址和3座大型墓葬尤为重要。特大房址F105的主室面积204平方米、F106室内面积240平方米，房子的墙壁和居住面均涂成红色。3座大型墓葬的规模之大、葬具和随葬品处理之复杂，这些考古发现都是以往所没有见过的。房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墓葬是“阳间”生活的折射。上述特大房址与大型墓葬考古发现，反映了距今5600年以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考古学文化特色，再现了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社会文明化进程，使之成为目前考古发现所知的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仰韶文化中心聚落。近年来各地开展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证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三门峡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庙底沟类型已经东达河南东部、西到甘肃东部，南至湖北、北入河套。至于庙底沟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影响更为广阔，东到沿海、西至甘青，南及长江南北、北达长城内外，其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大地分布与影响范围最大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在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中，以三门峡陕县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满天星斗”中最为耀眼的“恒星”。它与其它同时期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其它考古学文化相比较，不是“半斤八两”关系，它是华夏文化的“母体文化”或曰“主体文化”，其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历史“权重”，在中华文明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而“中原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出来的。这里的“中原”涵盖了豫西、晋中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三门峡地区位于这一考古学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带。夏文化直接承袭于“中原龙山文化”，最早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从三门峡地区走出的，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夏王朝与商代早期王朝都城的京畿之地，这种政治、文化区位优势，一直从夏商王国时代延续到汉唐盛世。

自西周至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相继为历代王朝都城，号称东西“两京”，三门峡地区适于洛阳与长安东西之间，不论这些王朝的都城在长安或洛阳，这里均为京畿重地。因此，三门峡地区历史时期的许多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诸如三门峡虢国上阳城遗址和虢国墓地、三门峡秦墓与向阳汉墓、黄河的古栈道、渑池的鸿庆寺石窟、隋唐东都离宫遗址、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宋代陕州漏泽园遗址等。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三门峡地区考古发现资料极为丰富，从时代上包括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考古发现，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所有时代；从考古发现资料内容上看，有古人类化石、旧石器，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及陶器、玉器、动物群，有历史时期考古的城址、墓葬、栈道、石窟及其它相关遗物。田野考古资料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又是推进学术新进展的助动力。三门峡地区田野考古多年来取得的丰富田野考古新发现，使与三门峡地区相关的考古学研究硕果累累，这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但是由于三门峡地区的上述田野考古简报、报告及考古研究论文等，其中有的已发表或出版多年，而且又多发表在各种相关学术刊物上，作为从事、关心三门峡地区考古工作人们来说，看到、看全上述三门峡地区考古文献实属不易与困难。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三门峡地区考古研究学术

成果的社会作用，进一步促进三门峡地区考古科学事业的发展，三门峡地区的学术同人，将三门峡地区历年来发表的有关三门峡地区考古学术成果汇聚集成，这一造福当代、惠及将来的举措，必将为三门峡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序”的最后，我还要再说一下，老朋友久昌先生主持编辑的《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这一学术功德之举的“大手笔”，实在使我深受感动，十分景仰！

2009年12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前言

◎李久昌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太史公此处所言“三河”系指汉代的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及弘农郡的东北部分。从现代行政区划来说，其分布范围大致为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及陕西东部一部分，即今河南洛阳盆地、陕西关中平原和晋南汾、涑河盆地。这一黄河三角地带今天虽处在豫晋陕三省边缘区，但中华远古文明正是在“三河”地区这方发达的原始文化圣地上孕育、发展，最终成长为位居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中心地位。

三门峡地区就位于“三河”地区的结合部、交汇点，其东与洛阳市为邻，西连陕西潼关，与古都长安相望，北隔黄河与三晋呼应。现今所辖包括湖滨区、陕县、渑池、义马、灵宝和卢氏等县市，以崤山为界，分属三门峡盆地和洛河卢氏盆地、渑池盆地。崤山还是黄河和洛河的分水岭，也把三门峡地区与郑洛地区分割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地理单元。南临秦岭支脉——小秦岭和崤山，北临中条山，东接渑池韶山，西连渭河谷地，黄河自西向东流经盆地，构成了三门峡盆地的周围轮廓，整个形势看似一长廊状。它既是华北平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又是我国东部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三门峡盆地内地势总体西南高，东北低，从南向北海拔高度由2000米以上递减到低于200米，高低悬殊明显。盆地内洪积、冲积和坡积黄土广泛分布。小秦岭、崤山以北地带，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度逐渐降低，地貌类型依次为基岩山地——黄土丘陵、台塬——河谷平原阶地。盆地内河谷平原、塬地、黄土丘陵、山麓冲洪积平原呈与盆地一致的东西向延伸，南北排列。主要的分支山脉之间都有独立的水系分布，山脉与水系相间排列。受黄河及其支流青龙涧河、苍龙涧河、弘农涧河、洛河等的切割，许多山体被切割冲蚀成隘口、深谷，并且有孔道与外界相连。

三门峡地区自古就以地理环境优越险要著称。《战国策》苏秦说：“秦东有崤函之固”。“崤函”，即崤山与函谷关之合称，是对其山峰险陡、深谷如函地理形势的形象表达。后屡见于文献，并演变为区域地名。《读史方輿纪要》说：“今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硤石、陕州、灵宝、阌乡，而至于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纡回。崤、函之险，实甲于天下矣。”虽然，从新安至潼关都可称“崤函之地”，但其主体在今三门峡地区，因此后世也用“崤函”来指代三门峡地区。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北宋以前，我国的政治舞台和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在黄河下游和黄

河中游的泾渭平原，在这个区域内形成了长安（包括丰镐和咸阳）和洛阳两大中心城市和“关中”、“关东”或“山东”、“山西”两大经济区。这里的“关中”与“关东”和“山东”与“山西”其实就是今天三门峡地区的崤山和函谷关两边，函谷关在崤山之上，是战国时秦国和山东诸国的分界处。这山东和山西也是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的分界之处。三门峡地区正处在两大经济区之间，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不论是陆路还是水运都是必经之地。这种不乏与外部沟通通道又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使得这一区域的文化能够从容地孕育与形成，同时也使得这一带的文化能与外部文化沟通互动，不至于停滞而能始终保持活力。

三门峡区域地理环境总体特征及其内部差异对该地区文化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它设定了三门峡地域文化发展富有个性的方向，最终形成了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区域文化系统。我们把这一文化系统称之为“崤函文化”。这应是三门峡区域文化的科学称谓与命名。

一般说来，一种区域文化的确立除了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外，还必须具有独立的文化个性和持久稳定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该文化的历史渊源与传承。凭借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勾画崤函文化的形成和演化的脉络。

（一）史前时期：崤函原始文化的滥觞

崤函文化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显示，三门峡地区是华夏最早的古人类生存空间之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丰富且具有相对独立的地域特点。1957年卢氏横涧乡发现的距今4000多万年的“卢氏跗猴”化石，是亚洲发现年代最早的灵长类，为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重要的佐证。1987年在灵宝豫灵黄土塬上发现的“豫灵人”头骨化石，是河南省境内首次发现的一具时代较老、形态较完整的古人头骨化石，距今15万年左右。此前1976年至1979年，在卢氏横涧乡还发现了4片距今10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后期“卢氏人”智人头骨化石和2枚牙齿化石。现今三门峡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古人类活动地点已超过50处，是目前河南省发现旧石器地点最多的地区，并且从早更新世的西侯度文化到晚更新世之末的邢家庄石器类型，各个阶段旧石器文化绵延不断，早中晚期都有。出土的打制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工具表明，当地的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和缝制衣服等，从中可见崤函原始文化朦胧的曙光。有关研究还表示，分布于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是一脉相承、自成系统、土生土长和自行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同时因地处南北文化的交会地带，其与同时代的山西西侯度文化、匭河文化、丁村文化人类群体及南方汉水流域和洛南盆地旧石器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南北文化的特点都能见到。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更在这里点燃了人类黎明的熊熊火炬，掀起了三门峡区域开发的第一次浪潮，区域文化特征也在此过程中得到第一次充分的展示。据考古学家研究，三门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谱系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一脉相承的关系，且自成一体，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每一种新文化的出现，都是在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间没有出现文化中断、突变的现象。不仅如此，属于新石器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是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而命名的，由此也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第一页。仰韶文化繁盛期的庙底沟类型文化，也是因1953年在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它的发现，最终确立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早晚关系，廓清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分别从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又是首先在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被识别出来。由此可见，三门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广泛代表意义的。它是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三门峡本土的始源性文化，既存在着本土文

化的长期传承与播化，又显示出对周边及更广大区域四方文化不断的涵化与接纳。

仰韶文化时代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繁荣阶段与向文明时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在这一时期所显示的意义，除以“仰韶文化”命名而具有整个时代意义外，还是仰韶文化分布最为集中和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程度最高之地。目前三门峡地区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有200多处，占河南全省总数的五分之一，占全国总数的二十五分之一。平均每52.5平方公里就有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与中原其他地区相比，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聚落所占地域最小，但仰韶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特大、大型、中型聚落所占比例最大，已发现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比比皆是，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级聚落有6处，几占河南全省的一半，其分布密度之高，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正因为如此，三门峡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是不言而喻的。

在仰韶文化众多类型文化中，庙底沟文化最为繁盛。已发现的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基本属于庙底沟文化类型。庙底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900~5600年，相当于文献中所讲的黄帝时代，而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也极为相近。据文献记载，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中，炎帝和黄帝两支氏族部落是构成华夏部族的基础，这两支氏族沿着黄河流域向东发展，其早期主要活动区域就在豫晋陕交界地带。著名的铸鼎塬聚落遗址群就位于豫晋陕交界处的灵宝市。“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司马迁《史记》记载的黄帝铸鼎升天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从汉武帝开始在此建陵修庙，祭祀黄帝。黄帝陵前矗立的唐贞元十七年（801年）“轩辕黄帝铸鼎碑铭”，是全国目前发现的唯一记载黄帝铸鼎事实的一块碑刻。黄帝陵本身就是一处庙底沟文化遗址。以铸鼎塬为核心，250平方里的范围分布着30余处庙底沟文化遗址，像卫星一样围在铸鼎塬一周，其中，北阳平遗址和西坡遗址面积约在近百万平方米，它们与周围中小聚落形成了不同的等级，其文明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西坡遗址揭露出的两座特大房址和3座大型墓葬，以及大型蓄水池、南北护城壕、贵族墓地，连同玉钺礼器、发达的制陶技术和刻划符号，显示了庙底沟文化聚落中心地位的特点。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的黄帝庙、黄帝陵、荆山、夸父山、蚩尤山、三圣村、五帝村等，都是以铸鼎塬为中心的，考古发现亦证明了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在铸鼎塬。根据上面几方面的信息，我们可以认为：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中心在晋陕豫交界三角地区，核心在铸鼎塬。铸鼎塬是黄帝族群早期活动的基地，到晚期黄帝一统中原后复归故土，在此铸鼎升天。

以铸鼎塬为中心，庙底沟文化以其绚丽多姿的彩绘“花”纹为旗帜，向四方播散，对周围广大地区显示了明显的文化优势和主导作用，开启了“华”夏族群浩荡洪流的先河。鼎盛时期控制了东起豫中平原，西至青海东部，南至汉水中游，北达河曲地带的中原广大地区。影响所及更是东越渤海，南抵长江之滨，北逾燕山之阴。它所传播的不仅只是一些纹饰题材，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的认同，促成了各地文化趋同，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统一”的时代和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最早“中国”的中心就在铸鼎塬，最早的“中国”就是从三门峡地区走出的。

新石器时代末期，三门峡地区在黄河中游地区最早进入龙山时代。这里不仅出现了像三门峡小交口这样面积达240万平方米，居全省龙山时代聚落之首的遗址。而且，以该地区典型遗址命名的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晚期的“三里桥文化”（因1956年在陕县三里桥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豫西、晋西南和关中极东部地区）环环相接，特征突出，建构起了这一时期三门峡地区文明的大厦，孕育并最终发展成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率先步入文明时代。

（二）三代时期：崤函文化的形成

三门峡地区在夏代属《禹贡》豫州之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夏后皋是夏代第十五代王。第十代王孔甲墓葬所在地有两说：一说在北京延庆东北三崤山处，一说在现在豫西崤山深处。古代陵墓与所居或不至于太远。从孔甲的活动范围与周边的部族关系，后者可能性更大些。《容成氏》简文：夏桀在鸣条失败后，“桀乃逃之南巢氏”。按巢与焦音同相通，南巢即南焦，又称作焦门，地在陕州故城南，即古焦国所在地。桀在南巢溃败后又从此过河逃亡晋南。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证实了三门峡地区是夏文化两大区域豫西和晋南的中心地带。

崤函文化的初步形成是与作为政治实体的西周焦、虢二国，尤其是后者的建立和逐步强盛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西周分封制下的焦、虢的建立，使三门峡地区首次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在制度上统一和巩固了本地区内人们的文化观。这是三门峡区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阶段。周人对三门峡地区的经营始于灭商前文王对虞芮之讼的调停，从而控制了崤函要塞。武王灭商后，分神农之后于焦，建立焦国，是为姜姓焦国。武王、康王年间又改封姬姓焦国。为加强周之统治，武王以境内陕塬为周、召二公“分陕而治”之界，“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焦国的疆域在今陕县、灵宝一带。公元前775年（周幽王七年），为虢国所灭。限于材料，焦国的史迹还模糊不清。但近年来在三门峡李家窑及陕州故城附近已揭露出焦国墓葬及焦国都城的遗迹，其墓葬所出文物与虢国有明显差异，而具文化个性。在焦国废墟上建立的虢国以上阳为都城，疆域扩大包括今三门峡和山西平陆、陕西潼关一带。虽然版图不大，却物阜民丰。因是周王室嫡亲，虢国便时时防备并讨伐诸侯对王权的挑战，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南征北战，盛极一时。又因虢国雄居大河两岸，扼守潼关至崤函一带天险，控制黄河渡口，具有中原、关中和山西交界地带这一地缘联系，自然成为进出中原和关中的战略屏障。虢国的子民们，充分发挥自身东西交接的区位优势 and 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虢国文化。位于上村岭的虢国墓地，已发掘了260余座墓葬和车马坑，出土铜、玉、铁、陶、骨、石、木、皮、麻等十余类3万多件文物，其中青铜器和玉器为大宗。虢国青铜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多数器物上有铭文，记录着随葬者的姓名、器物的用途。虢国玉器质地良好、做工精巧、线条流畅、生动传神，为我国同期出土玉器中所罕见。特别是虢国墓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以块炼法锻制而成，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其铸造的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堪称“中华第一剑”。尤其重要的是被湮灭了2600多年的虢都上阳城在今三门峡市中心李家窑的发现，以实物资料表现了虢国城市建设的水平与特点，也再次确认了玉柄铁剑等一大批稀世文物的准确归属。这些资料表明，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早期，在今三门峡地区活动的古焦国、虢国虽历经沧桑，但一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在这块地域上独立而顽强的存在和发展，直到公元前655年为晋国所灭。在这样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焦国、虢国分别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一直在今天三门峡地区有着稳定的疆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了统一而稳定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崤函文化。毫无疑问，焦、虢二国主要是虢国文化，是崤函文化的最早形态，对后来三门峡地区的文化走势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及至风云跌宕的春秋战国时代，三门峡地处关东、关中的战略枢纽，不仅是关东诸国攻秦的前沿要地，更是秦国逐鹿中原的战略要地。先是晋国人、魏国人和韩国人由北向南进入三门峡地区，后是秦国军队由西向东推进入三门峡地区，设陕、湖、卢等县建置，建立函谷关，三门峡地区成为古代东西两大文化交流、融合的集散地。崤函文化注入了更多的关中文化（秦文

化)的基因,同时又杂有晋文化因素,推演出唇亡齿寒、假虞灭虢、紫气东来、老子著经、秦晋崤之战、秦赵渑池会、合纵连横、公孙白马、终军弃繻、鸡鸣狗盗等历史典故。这些辉煌成就的源头活水,正是中原文化与关中文化、晋文化的交流碰撞而显现出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律动。

(三) 从汉魏到隋唐:崤函文化的兴盛

从汉魏到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全面发展的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汉代中国的经济地理划分为四个地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其中,“山东”、“山西”正是以三门峡地区的崤山和函谷关为划分界限的。三门峡地区正处在当时最发达的“山东”、“山西”和“关中”、“关东”经济区之间,自然成为这两个地区的交通纽带,据“关河之肘腋,扼四方之嚆要”。《三辅黄图》上有秦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的说法,这既是秦人博大气魄的海口,也反映了关中平原惟有函谷关是东界出口的实际。这一地缘关系,同样成为以后汉、唐定都长安都不可改变的现状。关于这一方面,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李健超先生曾指出,“自殷周至隋唐三千年间,黄河中下游两岸既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各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若能牢固掌握这一片地区,也就足以控制全国,在这个经济区内形成了中心城市长安(包括丰镐和咸阳)和洛阳。西周都镐,又作雒邑,抚有东土,藉以控制全国。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长安为西京;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为东西二都。而无论两大经济区之间或东西二都之间的交通往来,都必须通过三门峡地区”。贯穿于两大经济区和洛阳长安东西两大都城之间的交通道路,便是“崤函古道”,研究表明,它是由陆路交通和水路黄河漕运共同构成的水陆“双轨”交通体系。陆路上有函谷关、潼关之险,水路上有三门砥柱之阻,交通极为不便,但舍此别无选择。崤函古道作为连接古代洛阳和长安两大都城最重要的交通孔道之枢纽,滥觞于先人拓荒的新石器时期,形成于中华文明勃兴的西周时期,繁盛于汉唐时代,被古人称作“万国朝天之路,东西辐辏之区,宾使川流,驺骑云至。”在两千多年之历史进程中,崤函古道曾在支撑周、汉、隋、唐等重要王朝对内对外之政治控驭、军事攻防、商贸交易、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三门峡地区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段,便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对外交往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帝国中心的重要经济命脉和黄金通道,在封建王朝“东制诸侯”、“西给京师”、“连接东西”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凭借襟带两京和两京锁钥的独特位置 and 地位,崤函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碰撞、整合,进一步发展成为以虢国文化为底本,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文化。形成了三门峡区域发展的第三个高潮阶段。在物质文化方面,三门峡区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人口持续增长,出现了像陕州、弘农县(郡)这样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和商贸集散地。陕州城向以江淮漕米入济关中的水陆转运站著称。灵宝张湾汉釉陶制作技术、渑池球墨铸铁工艺、黄河古栈道工程技术分别代表了当时各自领域的发展水平。在学术文化方面,这里是汉代“关西夫子”杨震授经讲学的地方,是北魏“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禅学”思想的重要滋生地,是早期道教天师道创立的地方。东汉“草圣”张芝的草书墨章、东汉魏晋北朝弘农杨氏家族文化、唐代诗人上官仪、上官婉儿(陕县人)、宋之问(灵宝人)、姚合(陕县人)的诗,岑参、韦庄、王勃、元稹寓居虢州的诗,“诗圣”杜甫途经三门峡地区时留下的不朽诗篇“三吏三别”等,都显示了崤函精神文化的精髓。在宗教文化方面,以陕县空相寺、安国寺,义马鸿庆寺石窟、陕县温塘石窟、渑池石佛寺石窟为代表的众多寺院、石窟的繁盛,不仅表明此地是中国佛学的圣地,更见证了东西方文化在此的融合。有人统计了唐代河南人才的地理分布状况,洛阳和三门峡分别以 84、

48人分列全省第一、二名。这也是崤函文化在汉唐成熟、兴盛的表现。此时的崤函文化以其融合四方、会纳百川、连通东西的兼容性而显得千姿百态，这既进一步展示出崤函文化所具有的“交通特征”、“移民特征”、“关隘特征”、“漕运特征”和“复合型特征”，同时又使崤函文化的内涵变得丰满起来，逐渐成为一种多元融会、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体系。唯其如此，崤函文化得以成为一种时代先进地域文化，跻进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之列。

（四）宋代以后：崤函文化的缓慢发展

宋代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迁北移，原有的洛阳长安两京格局不复存在，崤函古道的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黄河漕运基本停止，三门峡作为原两京交通枢纽地位也日渐式微。崤函文化赖以存在的、发展的地区经济基础相对削弱，三门峡也与它周边的帝都洛阳、西安一样，日渐萧条、落寞，三门峡地区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崤函文化自此也陷于停滞局面，仅能以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地位和景观，出现在河南历史文化地图上。但即便如此，崤函古道仍然是受人青睐的横贯东西的大干道，凭着数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凭借着作为名州望郡的陕州这座行政地理平台，以陕州太阳渡、茅津渡、灵宝老城渡为代表的黄河码头的崛起，贯穿全境的崤函古道（官道）及其沿途商贸集镇的兴盛，仍使这片文化热土声名远播，出现了像草堂居士魏野（北宋陕州陕县人）、许氏父子四尚书（明灵宝梁里村人）、理学大师曹端（明渑池窟陀里人）、豫西儒宗王以悟（明陕州张茅镇人）、理学大师张信民（明渑池乔岭村人）等文化名人。

纵观三门峡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知道，崤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新石器时代是它的基础，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是它形成期，汉至唐是它的繁荣发展期，以后是它的缓慢发展时期。崤函文化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早期居民充分利用本地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不断扩大生存空间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结果。崤函文化是以三门峡地区为地域依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生长、发育及其衍变的种种文化事象的总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地域性文化。在崤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始终受到来自长安和洛阳两京的两股外引力，并以古道交通和两京锁钥的形式，与它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格局直接促成了双方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整体上说，崤函文化的基本特征属于河洛文化。而从地域特色上来讲，这里在历史上是中国古代东西对峙和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中原文化、关中文化、晋文化三大文化碰撞、融合的中心地区，所以崤函文化表现为一种复合型文化，崤函文化区属河洛文化区的亚文化区。

二

人事有代谢，江山留胜迹。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为三门峡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但在三门峡科学考古事业诞生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人们在认识三门峡地域历史和文化时，只能借助于《史记》、《元和郡县志》、《陕州志》及辖区各县县志等地方文献。这种局面直到1921年才得以改变。是年秋冬时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对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以该地命名的“仰韶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证明三门峡正是华夏文明的一处源头，也使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找到了承载的基石与根源。同时，它还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原始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在学术上也开创了四个第一：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揭开了我国新石器考古的第一页，揭开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第一页，命名了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正是由于90多年前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正式在中国人文科学中增加了考古学这一学科。仰韶村遗址因此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和人们向往的远古文

化圣地。三门峡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此也步入了现代科学的轨道。

自安特生拓荒性的考古发掘之后，尤其是解放后，考古学者对三门峡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逐渐展开，并且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通过长期不懈的考古调查、发掘，目前已经究明了三门峡地区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9 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 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80 余处，馆藏文物 7 万余件。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全市又新发现文物点 580 余处。三门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不仅数量多，价值高，而且分布广，时代蝉联。其中，在“中国 20 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中，三门峡市就有 3 项：三门峡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三门峡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三门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上阳城与虢国墓地的勘探与发掘。新近发现的铸鼎塬聚落遗址群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包含物最为丰富的仰韶时期古文化遗址群，也是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核心区。铸鼎塬遗址群中的西坡遗址已入围“200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选遗址，也是“十一五”期间国家资助的全国 100 个大遗址之一。大量的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文明在三门峡地区的发展脉络与走向，也有力地证明了三门峡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可争议的核心地位。依偎着滔滔黄河，三门峡见证了母亲河的千年沧桑，同时，也丰富着灿烂的华夏文明，彰显着三门峡这座古都名城的“文明摇篮、两京锁钥、丝路节点、漕运枢纽、古都名郡”的历史地位和辉煌。这些考古发现，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信息，或纠前贤之误，或补史乘之阙，或成一家之言，不仅是研究三门峡地区考古及历史文化的重要成果，为三门峡这座古都名城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在区域开发和城市建设中，首先要重视城市及其区域的历史文化，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整理和保存，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因为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都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这些独有的历史记忆和蕴含的文化精髓，无疑是曾经生活在这块沃土上的先人慷慨赐予我们的厚重馈赠，是我们城市的生命根系和精神魂魄。长期以来，对于三门峡城市历史的定位，人们常说它是“1957 年随着新中国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兴建应运而生的新兴城市”。如果仅仅是从目前三门峡的城市名称而言，此话不无一份道理。但如果从三门峡城市和区域发展史看，这样的认识和表述，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它割裂了历史城市与现代城市的关系，自我降低了城市的历史品位，进而也影响着三门峡城市个性与韵味的发挥。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是朝夕之间蓦然出现的，都有其生成发展的历史。现今的三门峡城市同样也是由历史城市发展而来的，其直接来源便是 3000 多年前建立的焦国和虢国古城。这两座西周古国的建立，奠定了三门峡行政区划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公元前 390 年（秦惠公十年）秦国在这里设置陕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 年）设置陕州，其后一直延续至明、清。陕县（州）故城自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元鼎三年）建立一直在今三门峡市区西北黄河岸边，直到 1957 年开始修建三门峡大坝因拆迁而废弃。至今，古陕州城仍为三门峡的一部分，三门峡市就是以陕县部分地区为其行政区域析置成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及其建设过程中的移民运动，不仅进一步展示出崤函文化所具有的移民特征、治水特征及其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开放创新、和而不同的精神，更是将崤函文化这种开放性文化体系在新时代扩而广之，赋予崤函文化以新的发展，开创了三门峡区域开发的第四次高峰。现

在，考古学者已在三门峡市区北部和李家窑，发现了焦国古城遗址和虢都上阳城遗址。三门峡的城市建制史应当从焦国和虢国开始算起。陕州是古焦国、虢国的继承，也是古代三门峡城市发展的辉煌阶段。3000多年来，三门峡城市历史，虽有兴衰却绵延不断，犹如滔滔黄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门峡也是一座历史名城。不仅如此，由于焦国和虢国在三门峡立国建都，我的老师、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先生，根据古都判定标准，认定三门峡还是一座古都城市，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历史文化是增强一座城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是激励一座城市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以繁荣的文化为支撑，文化的繁荣是城市繁荣的重要标志。文化繁荣既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又是经济发展的表现。经济的发展是先决条件，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丰富而厚重的古都名城三门峡历史文化，无疑有着富有魅力的广阔的研究前景。深入地挖掘三门峡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层次的文化内涵，深入地了解三门峡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与无穷的魅力，以为三门峡城市发展和区域开发奠定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提供必要的历史文化依据，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回首望去，三门峡古代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章节；放眼未来，崤函大地，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三门峡深厚的文化积淀，还应该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留给后人的，不只是祖辈先贤登峰造极的成就，还应包括我们深沉的自省和不懈的奋进。而考古发现在重建我们的文化史，复原过去的生活方式，解释文化变迁的过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相互印证会使我们的研究更接近科学，认识更加接近真实。几十年来我国考古之发展，着实证明了“锄头重现历史”这一真理。

已有的三门峡地区考古工作，成就斐然。除了《三门峡漕运遗迹》、《庙底沟与三里桥》、《上村岭虢国墓地》、《陕县东周秦汉墓》、《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三门峡南交口》、《灵宝西坡墓地》等这类专著外，大量的学术成果还散见于各种报刊和内部资料，而不易于检索。因此，为总结三门峡地区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三门峡地区考古与历史文化的研究乃至中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三门峡地区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的社会作用，服务于学术，服务于学者，对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有关的考古资料进行及时的整理和汇编就显得尤为必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三门峡地区学者和研究机构，我们把延递文化薪火，弘扬民族文化，搜集和整理地方文献资料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义务，启动了《三门峡历史文化研究文库》项目，继2009年8月出版了《崤函古道研究》之后，又汇编了这一套大型考古资料合集。其意义正在于传承、保护和传播珍贵的民族学术文献遗产。我们希望《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的出版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以厚德于历史之三门峡，裨益于今日之三门峡。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的出版恰逢吉时。自仰韶文化发现90年来，三门峡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凝聚了众多前辈和时贤的心血，正是几代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成就了今日三门峡地区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事业。我们谨以此书献给这一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向前辈和时贤致敬。

2010年8月初稿

2011年2月改就

说 明

一、本书收录的是三门峡地区考古文献，包括考古发掘报告、简报、简讯和其他报道材料等，所收范围为自 1921 年著名的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至 2010 年底大陆地区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章。本书所定三门峡地区范围主要为现今三门峡市所辖的湖滨区、陕县、灵宝、卢氏、渑池和义马等地。同时，为便于从区域文化构成上更深入地认识三门峡地区考古文献的特色、成就和价值，也适当扩大收录了周边地区部分考古文献。众所周知，三门峡地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也是上世纪 20 年代随着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从这里起步的。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三门峡地区考古发现资料极为丰富，时代上包括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考古发现，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所有时代；内容上，有古人类化石、旧石器，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及陶器、玉器、动物群，有历史时期的城址、墓葬、栈道、石窟及其它相关遗物。因此，本书所收论著不仅是研究三门峡地区考古及历史文化的重要成果，而且对于研究中国考古及历史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本书收录文献的来源主要是国家级、省级刊物、出版物公开发表的文章，包括《考古》、《考古学报》、《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等。

三、对文献的选编原则是注重文章的学术性，力求资料全面，尽量将各方面的主要考古文献资料收录其中。因此，书中既收录有篇幅较大的文章，也收录有篇幅不大而又十分重要的。凡已见专著的，如《三门峡漕运遗迹》、《庙底沟与三里桥》、《上村岭虢国墓地》、《陕县东周秦汉墓》、《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北宋陕州漏泽园》、《三门峡虢国墓》、《三门峡向阳汉墓》、《鸿庆寺石窟》、《三门峡南交口》、《灵宝西坡墓地》等，不再收录。

四、为方便查阅，所收文献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先秦时期考古文献，分为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夏商周考古三部分。下卷收录秦汉至宋元明时期考古文献，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宋元明考古两部分。各卷所收文献按时代（朝代）先后为序，编入相应的部分，同一部分中又按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排次。对一些包括有多个时代的文献，则按时代最早的一种文化进行分类编排。

五、对已收录的文献，文字、线图一般全部收录。图版基本上收录，对于不清晰或有线图的图版则有所删减。插图、照片基本保持原大，个别尺寸较大或较小的则适当缩小或放大。图号则根据汇编的具体情况做一些改动。对原刊文稿中明显的错讹之处作了适当的校正。不过一些插图由于原刊印刷不够清晰，这次也未及重绘，多少影响了排印质量，还请读者谅解。

六、凡本书未收录的三门峡地区相关考古文献及研究论著，将其书目和论文题目列入附录一。同时，另附有三峡区域历史文化研究论著目录，作为附录二，以方便读者查阅使用。

目 录

序 / 刘庆柱

前言 / 李久昌

说明

上 卷

壹 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

- 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的旧石器 / 贾兰坡 王择义 邱中郎 (003)
- 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 / 黄慰文 (012)
- 河南省卢氏县发现人类化石 / 季楠 牛树森 (030)
- 河南省旧石器新线索及管窥 / 张森水 (031)
- 河南省新发现的旧石器和人类化石 / 张维华 (038)
- 渑池县又发现旧石器 / 张维华 曹静波 (054)
- 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灵宝县文管会 (056)
- “豫灵人”头骨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 冯兴祥 周华山 巴志刚 张光业 王磐基 张震宇
..... (065)
- 卢氏县段家窑旧石器地点 / 李占扬 (075)
- 河南卢氏发现黄土旧石器 / 杜水生 刘富良 朱世伟 张民 (076)
- 东秦岭南洛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和黄土堆积 / 王社江 鹿化煜 张红艳 赵军
R. Cosgrove 弋双文 孙雪峰 魏鸣 J. Garvey 马萧林 (084)

贰 新石器时代考古

- 中华远古之文化 / (瑞典) 安特生著 袁复礼译 (099)
- 仰韶器物小记 / 郭豫才 (140)
- 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 / 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 (145)
- 河南陕县灵宝考古调查记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队 (151)
- 洛阳专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 健永 裴琪 (155)
- 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 /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 (158)
- 一九五六年秋河南陕县发掘简报 /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 (169)
- 1957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 /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 (176)

- 河南陕县七里铺第一、二区发掘概要 /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 (188)
- 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和试掘 /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 (195)
- 河南渑池县考古调查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205)
- 河南渑池西河庵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212)
- 卢氏县祁村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 宁景通 (215)
- 渑池仰韶遗址 1980—1981 年发掘报告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渑池县文化馆 (216)
- 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 / 黄其煦 (242)
- 河南灵宝涧口遗址发掘报告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245)
- 灵宝北万回头遗址出土的彩陶盆 / 陈焕玉 (285)
- 灵宝荆山轩辕黄帝陵与黄帝铸鼎塬唐碑铭 / 杨宝顺 (287)
- 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工作硕果累累 / 张玉石 (289)
- 渑池县班村遗址 / 张居中 赵清 (292)
- 渑池班村新石器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人类环境学上的意义 / 孔昭宸 刘长江 张居中
..... (295)
- 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考古
研究所河南一队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灵宝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299)
- 荆山铸鼎塬及仰韶文化遗存的初步分析 / 张怀银 任敏录 宁建民 (325)
- 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调查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 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329)
- 三门峡南交口遗址发掘收获 / 魏兴涛 (347)
- 关家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 / 樊温泉 (350)
- 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 / 魏兴涛 孔昭宸 刘长江 ... (352)
- 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文化发现 80 周年 / 安志敏 (355)
- 试论班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 / 王建新 张晓虎 (360)
- 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试掘简报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 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荆山黄帝陵
管理所 (371)
-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荆山黄帝陵管理所 (390)
-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 2001 年春发掘简报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荆山黄帝陵管理所 (402)
-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105 号仰韶文化房址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荆山黄帝